

从文学文本到社会文本

——《亚瑟·默文》中的模糊性与理性阅读

李宛霖

内容提要 近年来,查尔斯·布朗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他的说教倾向、发展民族文学的愿望,以及对读者的关注,都成为了批评家们瞩目的对象,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布朗这些看似十分不同的兴趣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以布朗至今尚未受到太多关注的小说《亚瑟·默文》为研究对象,分析作者如何通过制造主人公道德品质上的模糊性引导读者理性地阅读与思考,并利用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平行关系,鼓励读者将这种思维习惯有效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解决现实中的困境。这样一来,布朗便将自己进行道德教化、发展民族文学与培养优秀公民的目标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他对模糊性的巧妙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美国的哥特文学传统。

关键词 《亚瑟·默文》 模糊性 黄热病 阅读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6.04.012

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是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的早期美国作家之一,最先关注布朗的西方批评家们,纷纷从不同角度挖掘布朗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在这些批评家笔下,布朗要么是重视道德说教的传统作家,要么是倡导发展美国本土文学的先驱,要么是力图通过文学创作提高民众鉴赏力的改良派作家,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这些说法虽然各有道理,但迄今为止,很少有批评家认识到布朗这些看似十分不同的文学角色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西方批评家对布朗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维兰德》(Wieland)、《埃德加·亨特利》(Edgar Huntly)这些代表作上,对其他作品则关注较少,而我国对布朗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针对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还是凤毛麟角。^①这一研究现状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布朗这位开创了美国哥特文学

先河的作家。在本文中,笔者以布朗的长篇小说《亚瑟·默文》(Arthur Mervyn)为例,分析作者如何利用一种道德判断上的不确定性,培养公众理性阅读、沉着应对社会变故的能力,从而使之成为推动民族文学以及新的美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从模糊性这一形式特点,而不是传统的人物、情节、场景这些叙事要素出发,探讨布朗这部至今尚未受到太多重视的作品,不仅有利于纠正学界之前对作品失之偏颇的解读,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布朗多重文学身份之间关系的理解。

在叙事形式上,《亚瑟·默文》沿袭了布朗一贯的模糊风格,但与《维兰德》以及短篇小说《梦游》(Somnambulism)这些经典的模糊作品不同,《亚瑟·默文》中的模糊性不

是围绕一个具体的故事细节——比如《维兰德》中指使维兰德杀死全家的神秘声音的来源，或者《梦游》中杀害戴维斯小姐的真凶身份展开，而是与我们对主人公亚瑟·默文道德品质的判断有关。它具体体现在我们作为读者，很难判定默文到底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还是一个外表善良背地却善于算计的伪君子。自1799年小说发表以来，批评家们对默文道德品质的争论便从未停止。学者们或认为默文是个不折不扣的道德模范，毫不利己，一心为人^②，或将他视作一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虽然口口声声为别人着想，但私底下却处处算计，为自己谋福利。^③

在这一分歧持续几十年之后，有学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分析这部作品的形式特色，而是应该把这些特色放在更大的文化以及政治语境下考察。斯泰西·玛格丽丝强调，我们应当“将关注的重点从小说形式上的复杂性转移到它在公共政治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上”。^④而雪莉·塞缪尔斯则将两者相联系，认为“这部小说通过曲折的情节、嵌入的故事、表里不一的叙述者、矛盾的证据，以及错乱的身份，为我们追溯了一个教育的过程，以及对家庭的渴望，两者能够归混乱于平静”。^⑤

鉴于这部小说批评的历史演变，笔者认为，我们不仅要重视小说的模糊性，也要探索这种模糊性的历史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形式与历史环境之间可能存在的种种联系。而对于《亚瑟·默文》这样一部以具体历史事件为背景的作品，我们要研究它的模糊性的历史意义，首先要关注这一模糊性与作品中涉及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在《亚瑟·默文》中，布朗以生动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1793年因黄热病肆虐而百孔千疮的费城。黄热病所引起的混乱局面，与因模糊性而产生的阅读体验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行类比关系，从中折射出布朗对于理性阅读的推崇，以及对于个人自我领导能力的肯定。具体来说，

这种模糊性为读者创造的阅读体验，与黄热病爆发期间费城民众的经历类似，都以混乱和权威缺失为主要特点。布朗借两种经历之间的类比，提醒读者，在面对真实或虚构的混乱局面而又缺乏权威指引的情况时，应保持冷静的头脑，果断采取独立的措施，而理智地思考与行动，在布朗看来，正是一名优秀读者，以及一名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优秀公民所必备的素质。

认识到这种对照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布朗的多重文学身份之间的关联，以及布朗对美国哥特传统的贡献。布朗最为我们熟知的身份是道德说教家，他在《亚瑟·默文》的序言中曾明确表示，他要“对全人类进行公平与人性的教诲”。^⑥但这一言论并不代表布朗只重视说教。事实上，作为美国开国以来的首批职业作家之一，布朗对很多政治性问题都有兴趣，包括发扬民族文学传统、培养优秀读者等等。在《埃德加·亨特利》的序言中，布朗曾写道“美洲大陆为自然主义者和政治家们开阔了新的视野，但却很少为热衷于描绘道德风貌的人提供素材。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会开展新的行动，生发新的好奇，从事与欧洲不同的新探索，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娱乐情志，还是教化人心，我们的国家都有无穷无尽的资源。”^⑦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布朗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坚信美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而要塑造这一传统，作家们需要关注以往被忽略的社会层面，包括道德。

除了挖掘新素材之外，布朗还坚信，本土文学要发展，作家们必须在方法上创新。布朗认为，真正的美国作家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唤起读者的激情、激发读者的恻隐之心”。^⑧布朗在强调作家的责任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读者在发展本土文学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一个作家的努力成功与否，还必须由开明、公正的读者去判断。”^⑨不仅如此，布朗还希望利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培养一

批热爱文学的优秀读者。凯西·戴维森观察到,布朗“希望让受过教育的读者喜欢上小说”,他还特别希望让这些读者“认识到小说阅读对于智力的益处”。^⑩

作为一名以创作哥特小说见长的作家,要做到以上这些并不容易,因为哥特小说起源于欧洲,无论从形式,还是主题上,都与欧洲的文学传统、社会风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⑪而且传统的哥特小说一贯以怡情为主,并不以教化或说理见长,^⑫但是布朗在《亚瑟·默文》中却大胆采用多种叙事手段,制造出一种持续始终的模糊局面,以此影响读者的思维、判断与观念,从而为自己利用道德思考来培养理性读者、发展民族文学的目标服务。

二

要全面了解《亚瑟·默文》中的模糊性,还要从小说的情节说起。小说一开篇,史蒂文斯医生(Dr. Stevens)在自己的家门口发现了身染黄热病已不省人事的默文。医生将他收留,并在妻子的帮助下,照顾他直至康复。史蒂文斯夫妇因为默文十分细心周到,又长得一表人才,对他甚是喜爱,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老友沃特利(Wortley)先生偶然到访,指认默文是大骗子威尔伯克(Welbeck)的帮凶,夫妇二人对老友的话不尽相信,但又无法释怀,遂向默文询问究竟,默文无奈之下讲述了一段个人历史。

据默文称,他幼年丧母,一直与父亲一起居住在费城附近的一个农庄上,但父亲后来娶了一个毫无教养又行为放荡的女佣,令他十分反感,于是离家出走,独自来到费城谋生。他在费城巧遇威尔伯克,并作为他的私人助理,寄居在他府上。默文到来后不久便发现,威尔伯克不但与自己收留的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克莱门扎(Clemenza)有染,并侵吞了克莱门扎的哥哥留给她的巨额遗产,还曾引诱过他自己的好友沃特森(Watson)的妹妹,令她身败

100

名裂,羞愤自杀,最后还将上门寻仇的沃特森也枪杀。尽管默文也认为威尔伯克行事不端,罪行滔滔,但他还是帮威尔伯克掩埋了沃特森的尸体,不料威尔伯克却就此失踪,杳无音讯。

默文随后离开费城,来到哈德文(Hadwin)的农庄上暂居。他钟情于哈德文美丽的小女儿伊莱扎(Eliza),想娶她为妻,但后来又因为伊莱扎的遗产太少而改变初衷。黄热病在费城爆发后,默文为了寻找伊莱扎的姐姐苏珊的未婚夫沃勒斯(Wallace)而返回费城。不料却在搜寻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克莱门扎的哥哥留下来的另一笔遗产,正当默文左右为难,不知该如何处置遗产时,威尔伯克突然出现了,他企图骗取巨额支票,却引得默文将支票烧毁,一怒之下威尔伯克拂袖而去,留下身染瘟疫、病入膏肓的默文独自等死。默文企图返回农庄,途中因体力不支,晕厥在史蒂文斯医生门前,于是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小说的第二部分承接第一部分开头,继续讲述默文被史蒂文斯夫妇收留后的故事。默文复原后,回去看望哈德文一家,却发现哈德文与苏珊双双在瘟疫中殒命,默文只得带伊莱扎离开,但他以伊莱扎太年轻,不适合到外面闯荡为由,将她托付给一位路上遇到的好心人,自己则独自返回费城解救克莱门扎。原来威尔伯克在出逃前,将已产下孩子的克莱门扎弃置于一名妓女家中,默文再次找到她时,她正抱着死去的孩子啼哭不已。默文还在妓女家巧遇了丧偶的富贵寡妇菲尔丁夫人(Mrs. Fielding),但菲尔丁夫人似乎并不清楚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妓女。

后来,威尔伯克的罪行被揭发,他本人也锒铛入狱,临死前,威尔伯克将他从沃特森的尸体上找到的四万英镑交给了默文,默文了解到这笔钱真正的主人之后,不假思索地将它物归原主。此后,默文又奔走于一位温特沃斯夫人(Mrs. Wentworth)与菲尔丁夫人之间,希

望为克莱门扎和伊莱扎找到合适的庇护之所。最终，他劝服了温特沃斯夫人收留克莱门扎，并将伊莱扎托付给了菲尔丁夫人。全部事都尘埃落定后，默文跟随史蒂文斯，开始了学徒生涯，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已深深爱上了菲尔丁夫人，并在史蒂文斯的鼓励下，向菲尔丁夫人表明心迹，于是在小说的结尾，默文与菲尔丁夫人喜结连理。

从以上的故事梗概中，我们不难看出默文这个人物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他似乎是个品格高尚的人，他愿意为了别人的事奔走，即便因此置身险地也在所不惜，他也不贪恋钱财，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分文不取，如数奉还。但另一方面，默文又似乎很会为自己筹算，他喜欢依附有财富、有地位的人，为了取悦对方，也会顺应对方提出的哪怕不合理的请求。在婚姻方面，他钟情的对象都是能给他带来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的人。批评家们多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是因为小说当初在匆忙之间写就，作者来不及细察，加上布朗本人对人物以及情节的掌控力不足这些原因。^⑬但我们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这种围绕默文道德品质的模糊性实际上是依托多种叙事手段而产生的，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视作马虎创作或者能力不足的结果。相反，它很可能是一处有心的设计，而探索这种设计究竟服务于何种目的，则是我们了解作品的关键所在。

在开始这种探索之前，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布朗用以制造并维持这种模糊性的三种叙事手段。第一种是人物叙述（character narration）。作者通过人物叙述给读者提供了直接观察默文言行的机会（如果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则人物的言行都由第三人称叙述者转述，印象不够直观），以便察觉不一致之处，而由于默文的故事中一早便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这种现象又贯穿始终，它们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读者对默文的判断。举个例子来说，默文多次声称只想在农庄上靠劳力养活自己，但他离家出

走后，却毅然决然向城市进发，中途遭遇挫折也不改初衷。另外，他自称只以别人的利益为念，从不考虑自己，却屡屡做出利己之事。由于这些不一致的存在，唐纳德·伦奇（Donald Ringe）认为默文对自己的真实意图缺乏自知，而埃莫瑞·艾略特（Emory Elliot）则批判默文表里不一，是典型的伪君子。由此可见，无论是持同情还是怀疑态度的读者，这些矛盾之处都会影响他们对人物道德品质的评价。

第二种手段是引入与主要视角形成冲突的其他视角，从而为读者开辟不同的解读可能。比方说，当读者在小说开头，因为史蒂文斯的态度，对默文的人品逐渐建立信心时，布朗引入了沃特利这个人物，让读者的信心受到不小的打击。沃特利口中的默文是一场大骗局的始作俑者之一，这一形象与默文自述中那个被迫离乡背井，独自到大城市讨生活的年轻人的形象大相径庭。因此，沃特利的出现不仅能为默文后来的自述提供动机，推动故事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读者对默文和史蒂文斯两个人的看法。一方面，因为沃特利的指证，读者对默文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开始动摇，另一方面，读者也开始怀疑史蒂文斯的判断力，并与其拉开距离，不再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布朗后来引入默文家的邻居奥索普夫人（Mrs. Althorpe）的视角，也是为了达到类似的目的。据奥索普夫人称，默文是一个无所事事又无知的年轻人，既不事劳作，又不喜读书，不仅如此，他还与继母有染，丑事被发觉后，便偷了父亲的马跟钱逃之夭夭了。奥索普夫人的故事不仅再次给默文的人品蒙上阴影，它与沃特利的指控之间潜在的呼应关系也让读者猜测，会不会事情的真相与默文的自述完全不同。这种猜测不但会降低读者对默文的信任，也会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积极地搜寻反面证据，以支持这一不同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布朗虽然不断引入对默文

的自述造成冲击的观点与视角,但他也小心地维持着不同指向的证据之间的平衡,从而使读者不得不在不同的视角之间徘徊犹豫,斟酌权衡。举例来说,奥索普夫人结束她的故事后,布朗马上为我们介绍了另外一个人物——沃特森的弟弟威廉,他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默文的清白。威廉向史蒂文斯讲述了沃特森失踪的全过程,他讲述的内容与默文的自述完全吻合,这虽然不能完全洗清默文的嫌疑,但至少让读者对默文保留意见,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比较来解开谜题。

第三种制造模糊性的手段是多重镶嵌的叙事结构(即一个故事套一个故事,如此循环下去),这种结构能影响读者与他在故事世界中的“替身”(即代替读者对主要人物进行观察与判断的次要人物)的关系,从而加深读者的疑惑。众多角色中,史蒂文斯是读者在故事世界中的主要“替身”,他代替读者在文中从观察者的角度审视并判断默文的言行。随着故事的发展,布朗逐渐向我们展示了史蒂文斯作为一名观察者和解读者的优点与不足之处,并以此来调节读者与他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看到,当遇到复杂棘手的问题时,史蒂文斯常常不急于作出判断,而是花时间去了解、调查,并仔细比较各项证据,在此基础上作出合理的推论。譬如说,当沃特利再次向他力证默文的罪行时,史蒂文斯如是回答:

最近的一系列发现都让我感到十分困惑与不安,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解开这些困惑,考量这些发现的准确性,并充分估计它们的后果……我对你的话先暂且不做评论,待我将它与我自己对这个小伙子的了解相比较之后再说,当然这种了解不仅仅基于他的自述,也会基于我自己的观察。(251页)

史蒂文斯在这里展现出了一名优秀的观察

者所应具备的品质——理智、缜密、慎重,因此值得读者信赖,但他也不乏感情用事的时候。他曾表示,“邪恶有时候很模糊,让观察者辨别不清,我们的判断也可能偶尔摇摆、出错,但默文的脸就是诚实的写照。”(229-230页)史蒂文斯对默文的信任竟然是基于默文的面相,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判断力。综观全篇,史蒂文斯算不上是一个完全合格的观察者,因此缺乏权威性,而在没有权威指引的情况下,解读的任务则完全落到了读者自己头上。

三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三种手段在制造模糊性的同时,也对读者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理智、独立地分析故事中出现的一些复杂局面,仔细观察,认真比较,慎下结论。我们要了解布朗这一设计的深意,还要联系他在小说中对黄热病的呈现。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布朗将黄热病暗喻为一则哥特故事,并将默文喻为这则故事的“读者”,通过默文的所作所为,警示读者阅读须理智,切不可被情感冲昏头脑。黄热病的故事从小说一开头,史蒂文斯医生在家门口发现身染瘟疫的默文开始,布朗以疫病为引子,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充满了阴谋、暴力与血腥的个人历史,随着默文向史蒂文斯讲述他染病的过程,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逐渐被我们所了解。

在这一历史中,许多与黄热病有关的情节都会让读者联想起阅读哥特小说的情景,而处于事件中心的人物默文的表现,则在很多方面对应了一名初涉哥特小说的读者。当黄热病的故事刚从费城传到默文所在的农庄时,默文与一个刚开始接触哥特故事的读者反应一样,都表示了强烈的怀疑。在关于黄热病的传说中,费城死疫病的人无数,全城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但默文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故事不过是经过众人之口,被无数次扭曲和放大之后才变得

如此骇人，真相一定与传说相去甚远。可见，此时的默文，还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哥特故事，所以他的反应中既有恐惧，又有兴奋。“这个传说能占据我们的整个灵魂，让它处于静止状态，每当巨大危险来临的时候，一种壮美的感受会随之而至，让我们在惊愕与惋惜之余，也有一丝的兴奋和愉悦。”旁观的默文虽然认识到危险的存在，但知道它不会危及到自身，所以反而会因为它的存在而感到愉悦。他后来说，“我可以慢慢地在脑海中勾勒那些恐怖的画面，想象这场灾难的目击者和受害者的样子。”这些话恰恰反映了他当下只把黄热病当作“故事”来看待的心态，但与一般读者不同，默文至少刚开始还能保持淡定与冷静，而一些幼稚的读者则在刚听到故事的时候便“因为不安而呼吸困难，血液几近凝滞，且食不下咽”（130页）。

然而，当默文一步步地深入黄热病的故事之中，他的心态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不再能时刻保持清醒与理智，而是逐渐被故事的氛围所影响。就像哥特故事中那些深藏的秘密一样，有关黄热病的真相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才慢慢地被农庄的人所了解。这个认识的过程与一般哥特读者的体验很相似，他们对于一个哥特人物或者事件的认识也往往是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相信到深信不疑。到后来，默文不但相信了关于黄热病的故事，他还深受其影响，决定前往故事的中心地费城去营救沃勒斯，而后者在默文所接触到的黄热病的故事里，可以说是扮演男主角的角色。

默文怀着营救苏珊和沃勒斯这对苦命鸳鸯的愿望一心想要入城，尽管这一愿望并不实际。这也标志着默文作为一名哥特读者，进入了一个新的阅读阶段，在这一阶段，读者对人物的感情投入越来越多，甚至完全沉浸到故事之中，以至于分辨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构（或者什么现实可行，什么不可行）。正是由于默文对角色的感情，这时的默文已变得莽

撞而不顾后果，不但不顾及他自己可能遭遇的危险，更来不及考虑他的行为对别人可能造成的影响。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默文入城的决定害己害人，不仅他自己身染瘟疫，差点客死他乡，他的不辞而别与意外回归更是在不经意间要了哈德文与苏珊父女的命。从默文莽撞的行为所造成的种种悲剧看来，布朗是要以默文警醒读者，阅读时过分的情感投入并非好事。

当默文在城中的搜索一步步深入的时候，他所见到的悲剧也越来越多，默文如一个极度投入的哥特读者一样，对逐渐逼近的危险开始有了身体反应。“我的关节在打颤，冷汗也从我额头冒出来，我为自己的软弱而感到羞愧，我不断用理智说服自己，才终于恢复了一些平静。”（141页）凄惨的场面和可能到来的危险让默文双膝发软，几欲逃走，但是在理智的作用下，他终于克服了身体上的不适，继续前进。默文的表现反映了哥特读者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会因为危险而感到恐惧，另一方面，他又被一种力量所牵引，想要体验这种危险，默文的例子也说明，理智有时候可以作为一种“解毒剂”，部分抵消因感情过分投入而引发的负面反应。

可即便如此，默文也无法做到时刻凭理智应付复杂的局面。他在搜寻沃勒斯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复杂难解的情况，便会发挥想象力，做出各种猜想，而他的猜想最后经常被证实是错误的。譬如，默文染病后将自己反锁在威尔伯克的旧宅中，希望能不受打扰，静静死去，但他听到一个声音命令他离开，他起初以为那声音来自一个引诱了他的妹妹以及很多无辜女孩的恶棍，因而既气愤又害怕，不过他后来发现，声音的主人原来是威尔伯克。默文之所以判断失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太过紧张，想象力过于活跃，而这也体现了哥特气氛可能给人造成的心理影响，以及抵御这种影响的必要性。

默文逐渐被哥特气氛所感染，在一定程度

上失去了理智,因此称不上一个完全合格的哥特读者,然而,由于受哥特氛围影响而无法胜任合格读者角色的人绝不仅仅是默文。沃勒斯的雇主塞特福德(Thetford),以及大部分费城市民,都因为强烈的恐惧感,而做出不理智且有弊无益的事。当塞特福德家的一个女佣被发现染上瘟疫后,塞特福德大惊失色,迅速将女佣扫地出门,尽管她当时的病情并不严重,经过悉心照料完全可以痊愈。塞特福德的反应,也是全费城人的缩影。出于恐惧,大家纷纷将黄热病人赶出家门,或者拒绝为他们提供食物以及避难所,任他们自生自灭。这种以自我保护为初衷的行为最终适得其反,本来能够痊愈的病人因为缺衣少食而病情恶化,致使瘟疫更加难以控制,也让活着的人处境更加危险。这些后果无不说明了在危机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是屈从于本能)的重要性。

四

布朗对理智以及理性阅读的重视,最终还是源于他对读者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的关心。对于布朗这样以社会为导向的作家来说,阅读不仅与文学有关,更与社会、文化有关,良好的阅读习惯的意义最终还要体现在它对社会的功用上。因此布朗写作的目的不仅在于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还在于让读者更好地应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这两种能力在布朗看来是密切联系、密不可分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布朗在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类比关系,而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段,则与布朗长期以来对文学作品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有关。在《沃尔斯泰因历史学派》(Walstein's School of History)中,布朗明确主张,作家要创造一个尽可能贴近真实世界的小说世界,以使读者最大限度地从阅读中获益:

毋庸置疑,小说的用处在于向读者建议一

种与虚构的人物多少相似的思考与行为方式。要达到这一目的,实际情形与想象的情形之间必须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制造这种相似性也并非难事。在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事件当中,我们一定要挑选最能展现智慧与美德的,最与现实相类似的,最能让读者感受到他的情形与书中描述的情形之间的共通之处的,以及最能激起他像虚构的人物一般行事的愿望的。^④

可见,布朗是把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相似性作为向读者建议一种思考以及行为方式的手段。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主要从两个方面构建这种相似性。一方面,他将黄热病暗喻为一则哥特故事,以默文(以及其他人物)的经历警示读者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为自己的小说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阅读过程,这一过程因为权威缺失而陷入混乱,以此来照应黄热病爆发后费城的混乱状态。历史上的黄热病于1793年席卷费城,短短三个月内,费城五万人口中有超过四千人死于瘟疫,另有两万人逃离,包括大量的政府官员,因而针对疫情的救援行动只能在一些民间组织的帮助下艰难展开,但是由于对瘟疫的起因、性质、传播途径都不够了解,当地的医学界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加上医护人员缺乏,医疗条件差,黄热病的致死率很高,在费城民众中引起了大规模的恐慌。^⑤

这种很大程度上因为权威缺失而导致并且加剧的混乱在《亚瑟·默文》的阅读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呼应。《亚瑟·默文》自始至终采取人物叙述的方式,人物叙述者不仅缺乏全知叙述者的天然权威,也在故事的进程中暴露了种种观察力与判断力上的不足,因此不足以为读者提供权威的阅读指引,再加上模糊性的存在,读者在倍感局面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只能依赖自己的观察、判断来解开疑惑,走出迷局,而布朗正是以此来暗示读者,不仅阅读中

应当养成理智与独立的习惯，实际生活中的思考与行事也应该如此，临危不乱，当机立断，方能化险为夷。

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布朗对同时代的读者怀有很多期待，这似乎超越了一般哥特作家对读者所持的期待，但我们如果将它们放在美国后革命时期的社会大背景下，这些期待便更容易理解了。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几个惊天动地的大革命相继爆发：先是美国独立战争，再是法国大革命，然后是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起义。一连串的革命加剧了社会中动荡不安的气氛，促使布朗等年轻一代的作家纷纷从文学的角度探索革命在政治、文化、心理层面所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以威廉·高德温（William Godwin）、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作品为代表的激进民主学说从大西洋彼岸传来，进一步影响了年轻的美国作家的政治倾向，加深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⑥

简·汤普金斯曾指出，在美国革命与后革命时期，民族政治在文学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以至于“美国作家们谈论的话题几乎全部是关于共和国命运的”。^⑦布朗也不例外，他先后作为“美文俱乐部”（Belles Lettres Club）和“纽约友好俱乐部”（New York Friendly Club）的成员，参与了众多政治话题的讨论，包括自由的限度以及个人有无能力自我领导等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对于新社会制度下个人的角色的独到见解。在《亚瑟·默文》中，布朗便将他的政治观点融入到了对黄热病的展现中，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让因为瘟疫而陷入混乱的社会，在一定范围内恢复秩序、重归平静的故事。

从默文和史蒂文斯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布朗坚信个人的力量，认为个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混乱的社会在一定范围内恢复正常。布朗在《沃尔斯泰因历史学派》中就曾

认可并赞颂过个人在改变历史与社会方面的作用“人类社会能够因为它个体的成员而发生巨大的改变。”^⑧他同时也认为作家可以引导个人的行为朝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

每个人都在社会中处于一定的位置，非向善，即趋恶，而且他的行为和观念所产生的影响总会在一定范围内被社会感知。将人塑造成创造幸福或痛苦的工具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作用面很广……对我们来说，（要改变社会）与其治理支流，不如清理源头，但如果治理支流还一定程度上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清理源头就往往不可行了。政府与基础教育我们往往无力改变，但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协助个人抵御它们产生的不良影响。我们可以给个人灌输正确的意图，这样每个人便可以在他自己的社会以及家庭范围内做一些好事。^⑨

在布朗看来，作家可以通过作品影响作为社会成员的读者，因此他从很多方面将默文与史蒂文斯树立为社会行为模范。但他也认识到个人权威的局限以及有组织的领导的必要性，所以他笔下的模范人物也往往并不完美，尤其是默文，他的道德品质一直让读者难以捉摸。布朗为人物设计的模糊品质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得不仔细比较不同的观点、证据，并且前后联系，在此基础上做出尽量合理的推论，而这种思维习惯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让读者理智、冷静地应对突发事件，即便在没有权威指引的情况下也能妥善处理，化险为夷。可以说，在布朗手中，文学创作成为了一个可以改变读者的阅读习惯、思维方式甚至社会行为的有效手段。

不仅如此，以读者为导向的文学创作还能成为布朗发展民族文学的目标服务。布朗从事创作的时期正值美国开国后不久，当时无论是美

国文学,还是美国哥特文学,都亟需摆脱英国文学的影子,取得独立的文学地位。在这种大环境下,布朗将贯穿全文的模糊性引入哥特小说的创作中,可以说为哥特传统开辟了新的天地。一方面,这种持续始终的模糊性奠定了美国哥特文学体裁创新的基础。鼎盛时期的英国哥特文学相较于之后发展起来的美国哥特文学,更倾向于清晰地表达主题。作家们虽然会经常制造一些局部模糊,但这些模糊常常是为了增强悬念,对作品的意义并没有深刻的影响。而布朗将模糊性作为一种布局的原则,战略性地引导读者对人物进行不同的解读,这可以说是他对美国哥特文学的一大贡献,这种做法后来经过霍桑、爱伦·坡等人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成为了美国哥特文学的一大特色。另一方面,这种持续始终的模糊性在阅读效应上也具有革命意义,它推翻了传统的以作者为核心(即以作者的潜在意图为主要导向)的解读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民主的新模式,这种模式认可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将读者也纳入到意义的建构过程中。换句话说,布朗的全局性模糊催生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它把读者从遵从作者权威的义务(或者说诱惑)中解放出来,让读者独立地做判断,并为自己的判断承担责任。爱德华·沃特观察到,布朗“批判殖民式的阅读……将解读的任务完全交给读者”,并敦促他们去“探索自己的解读权威所产生的后果”。^①这样一来,布朗就能“要求读者拒绝附属地位,赋予他们自己以独立思考的权利,将他们从殖民思维中解放出去”。^②这一思想上的独立与解放,对于弘扬民族文学的目标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思想上独立的读者,才能摆脱外界众多褒贬声音的影响,公正地评价正在成长中的美国文学。

注释:

① 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仅搜索到六篇研究布朗作品的期刊

106

文章,其中五篇是关于《维兰德》(也有研究者译为《威兰》),一篇是关于《亚瑟·默文》的(研究者译为《亚瑟·莫文》),而且六篇文章均发表于2006年之后,国内至今尚无研究布朗的专著。

- ② 包括 Henri Petter, Harry Warfel, Norman Grabo, James Justus, 以及 Kenneth Bernard 等人在内的早期评论家倾向于这一观点。Grabo 称赞默文“正直、有正义感,在纠正他人的错误方面锲而不舍”,Justus 将默文称作“生来高尚的人”,Bernard 则认为“默文对这个世界复杂性的逐步接受,对它的多重事实的适应,是他成长的标志,而他坚定不移的理想则是他性情的写照”。参见 Norman S. Grabo, *The Coincidental Art of Charles Brockden Brow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126 页; James H. Justus, “Arthur Mervyn: Ame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42 (1970), 308 页; Kenneth Bernard, “Arthur Mervyn: The Ordeal of Innocence”,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6.4 (1965), 445 页; Henri Petter, *The Early American Novel*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 Harry Warfel, *Charles Brockden Brown, American Gothic Novelist*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49)。
- ③ 这一派占多数。Warner Berthoff, Michael Davitt Bell, Patrick Brancaccio, James Russo, Donald Ringe, 还有 Emory Elliot 等人都对默文的品格持怀疑态度。Berthoff 将默文称作“一条只会送顺水人情的变色龙”。Brancaccio 认为默文“爱管闲事,自以为是,莽撞行事,不光差点毁了他自己,还差点毁了他所遇到过的所有人”。Russo 也认为默文的“虔诚是伪装的,美德不过是一时便利,自嘲也只是带着算计的虚伪的谦虚”。相比之下,Ringe 对默文的评价更温和一些,他认为“默文身上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潜质,这种潜质能让他在获取他想要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不付出一点身体上或情感上的代价,还能让他为自己的善心善行而颇为自满”。参见 Warner Berthoff, “Introduction”, in *Arthur Mervy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2), xvii 页; Patrick Brancaccio, “Studied Ambiguities: Arthur Mervyn and the Problem of the Unreliable Narrator”, *American Literature*, 42 (1970), 22 页; James R. Russo, “The Chameleon of Convenient Vice: A Study of the Narrative of Arthur Mervyn”, *Studies in the Novel*, 11 (1979), 381 页; Donald Ringe, *Charles Brockden Brow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1), 64 页; Michael Davitt Bell,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Romance: The Sacrifice of Rel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Emory Elliot, *Revolutionary Writers: Literature and Authority in the New Republic 1725 - 1810* (New York: Ox-

-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④ Stacey Margolis, “Network Theory circa 1800: Charles Brockden Brown’s *Arthur Mervyn*”,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45. 3 (2012), p. 346.
- ⑤ Shirley Samuels, “Plague and Politics in 1793: *Arthur Mervyn*”, *Criticism*, 27. 3 (1985), p. 227.
- ⑥ Charles Brockden Brown, *Arthur Mervyn: or, Memoirs of the Year 1793*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 (以后引用, 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 ⑦ Charles Brockden Brown, *Edgar Huntly: or, Memoirs of a Sleep Walker* (Boston: S. G. Goodrich, 1827), p. iii.
- ⑧ Charles Brockden Brown, *Edgar Huntly*, pp. iii-iv.
- ⑨ Charles Brockden Brown, *Edgar Huntly*, p. iv.
- ⑩ Cathy Davidson, *Revolution and the Word: The Rise of the Novel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38.
- ⑪ 参见 E. J. Clery, “The Genesis of ‘Gothic’ Fiction”, in *The Companion to Gothic Fiction*, ed. Jerrold E. Hog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1 – 40 页; Michelle Burnham, “Is There an Indigenous Gothic?”, in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Gothic*, ed. Charles L. Crow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4), 225 – 237 页; 韩加明 《简论哥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载《国外文学》2000 年第一期, 36 – 41 页。
- ⑫ 事实上, 传统的哥特小说因为过于放纵想象、容易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反应而受到很多评论家的诟病, 这些人认为哥特文学过于纵情任性, 会破坏社会行为道德规范, 甚至引人走上歧途, 这与文学正面引导社会的责任背道而驰。虽然不少当代评论家指出, 哥特小说在意识形态上实际更趋于保守, 它是通过展示传统道德、法则遭破坏之后的可怕后果, 强调这些传统的重要与必要性, 并不是离经叛道的颠覆性文学,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 哥特小说毕竟在对传统道德的表现上与一般意义上的说教文学有很大不同。参见 Fred Botting, “Introduction”, in *Gothic* (London: Routledge, 1996), 1 – 17 页。
- ⑬ George M. Spangler 在文章中指出, 针对《亚瑟·默文》中众多的令人费解之处 “评论家通常的反应……乃是评论布朗在技巧上的不足。” John Cleman 也将《亚瑟·默文》中的模糊性归咎于小说 “在文体上的明显缺陷”, 还有布朗 “能力不足”、“创作匆忙”、“不及修改” 等因素。参见 George M. Spangler, “C. B. Brown’s *Arthur Mervyn: A Portrait of the Young American Artist*”, *American Literature: A Journal of Literary History, Criticism, and Bibliography*, 52. 4 (1981), 580 页; John Cleman, “Ambiguous Evil: A Study of Villains and Heroes in Charles Brockden Brown’s Major Novels”,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10. 2 (1975), 191 页。
- ⑭ Charles Brockden Brown, *Literary Essays and Reviews*, eds. Alfred Weber and Wolfgang Schäfer (Frankfurt am Main and New York: Peter Lang, 1992), p. 37.
- ⑮ 黄热病爆发的经过在 John H. Powell, *Bring Out Your Dead: The Great Plague of Yellow Fever in 1793*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9) 以及 Jim Murphy, *An American Plague: The True and Terrifying Story of the Yellow Fever Epidemic of 1793* (New York: Clarion Books, 2003) 两书中都有详细的描述。
- ⑯ 关于布朗生平以及创作背景的扼要介绍, 参见 Mary Chapman, “Introduction”, in Charles Brockden Brown, *Ormond; or, The Secret Witness*, ed. Chapman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1999), 9 – 31 页; Jeffrey Weinstock, “A Polemical Introduction”, in *Charles Brockden Brown*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11), 1 – 25 页。详细介绍可参见 William Dunlap, *The Life of Charles Brockden Brown* (Philadelphia: James P. Parke, 1815); Harry Warfel, *Charles Brockden Brown: American Gothic Novelist*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49); David Lee Clark, *Charles Brockden Brown: Pioneer Voice of Americ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2); Alan Axelrod, *Charles Brockden Brown: An American Tal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3)。
- ⑰ Jane Tompkins, *Sensational Designs: 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 1790 – 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4.
- ⑱ Charles Brockden Brown, *Literary Essays and Reviews*, p. 32.
- ⑲ Charles Brockden Brown, *Literary Essays and Reviews*, p. 36.
- ⑳ Edward Watts, *Writing and Postcolonialism in the Early Republic*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p. 99.
- ㉑ Edward Watts, *Writing and Postcolonialism in the Early Republic*, p. 121.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何卫

The Emplotment of *Tristram Shandy* and Restraint of the Hidden Morals and Ethics

WEI Yanhui

The emplotment of *Tristram Shandy* has always been a focus in the research tradition of Sterne. The established studies mainly interpret the narrative similarities between *Tristram Shandy* and modern or post-modern novels, yet neglect the attitude of the literary critical circle. The present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mplotment of *Tristram Shandy* and the plot convention of 18th century English novels shows that the novels borrow and absorb principles from Aristotle's dramatic plot, that "probability" has both aesthetic and ethical dimensions, and that novels play a role of order-construct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of the 18th century England.

From Literary to Social Text: Ambigu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in Charles B. Brown's *Arthur Mervyn*

LI Wanlin

As a recently "rediscovered" early American author, Charles Brockden Brown has begun to attract more and more critical attention. Critics have commented fairly extensively on Brown's interests in moral education, a national literature, as well as an intellectual readership, but few of them, however, have noted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these seemingly disparate interests. The present paper studies the moral ambiguity in Brown's novel *Arthur Mervyn*,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how Brown uses the ambiguity to guide the reader to think rationally and act independently in chaotic situations both real and imaginary, as he creates strong parallels between the fictional and the real world. Brown's treatment of the ambiguity allows him to combine his above-mentioned interests in a way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generic innovations of the American gothic.

Historical Coagulations: A Study of Pat Barker's Novel *Another World*

ZHU Yan

Pat Barker's novel *Another World* centers on the historical coagulations that cause trauma for both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Through the unfolding of traumatic events Barker expresses her reflections on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ages in murals and the haunting ghosts show the traumatic nature of history. Barker's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the novel is distinctive, indicating that time and history may both diverge from the linear development and coagulate around terrible atrocities.

Schizophrenic Border: Double Optics and Viral Crossover in Raymond Williams's *Border Country*

MI Jialu

This essay examines Raymond Williams'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Border Country*, the first novel of his ambitious "Welsh Trilogy". The aim of the essay is twofold.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unsettling issue of